

---

# 基于市民化意愿的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素质提升研究 ——对湖北省 294 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分析

梁伟军，马雪娇，李虹韦

(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0)

**【摘要】**根据计划行为理论和马克思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主要由市民化的自我控制力、自我效能感、期望价值、指令性规范和示范性规范五要素构成，市民化素质包括市民化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文化技能素质、政治法律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实证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强烈，市民化素质总体偏低；市民化意愿对市民化素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市民化意愿中的自我控制力、自我效能感、期望价值和指令性规范四大要素对市民化素质具有十分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其作用从大到小依次为序。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市民化素质提升成本分摊机制、提高市民化能力和市民化信念、提高市民化目标需求的满意度、完善市民化政策体系等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素质提升的应有选择。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市民化素质；湖北省

**【中图分类号】** F323. 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433X( 2016) 03-0102-05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学界研究热点，学界十分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市民化素质构成要素研究，对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能力的关系也有探索，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对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市民化素质提升问题研究偏少。从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的主体性地位考量，市民化意愿、素质和能力是其能否市民化以及如何市民化的“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强弱决定其市民化素质提升的努力程度，市民化素质水平决定其市民化的实际能力，基于市民化意愿提升其市民化素质成为提高市民化能力、推进市民化进程的关键环节。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现状如何？市民化素质如何？市民化意愿对市民化素质有何影响？如何以市民化意愿为基础来提升市民化素质？这些问题均需在实证研究基础上予以回答，进而为有序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提供相关研究和政策支持。

## 一、研究框架设计

---

**收稿日期：**2015 — 10 — 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交易成本视角下的农民工与受雇私营企业劳动关系研究”（13BJL006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建国以来的农民迁徙自由权研究”（14YJC810007）。

**作者简介：**梁伟军，男，华中农业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新型城镇化理论与政策。E-mail: liangwj@mail. hzau. edu. cn

### （一）变量选取。

1.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是本研究选取的第一个变量，指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人口对转变为城市户籍人口的愿望和想法。据埃塞克·阿耶兹的计划行为理论<sup>[1]</sup>及之后的解构计划行为理论<sup>[2-3]</sup>，意愿由行为态度、示范性规范、指令性规范、自我效能感和自我控制力等五要素构成。本研究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构成要素分为市民化的期望价值、示范性规范、指令性规范、自我效能感和自我控制力。市民化的期望价值指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城市户籍居民对满足其个人需要的价值。市民化的指令性规范指新生代农民工是否遵从国家的市民化政策导向，市民化的示范性规范指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听取亲朋好友的市民化意见，二者主要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在是否努力成为城市户籍居民问题感知到的社会压力。市民化的自我控制力指新生代农民工感知到的市民化成本对其市民化行为的影响，市民化的自我效能感指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有的文化技能努力成为户籍城市居民的自信程度<sup>[4]</sup>，二者主要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在非个人意志完全控制条件下实现其户籍城市居民愿望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共选择17个指标衡量，测量方法以李克特5点评分量表的形式为依据，划分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意”、“非常同意”五个评判等级，分值分别为1分、2分、3分、4分和5分。

2.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素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素质是本研究选取的第二个变量，是指新生代农民工转变为城市户籍居民应具备的素质因素。根据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人的素质可分为身体素质、社会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三个方面<sup>[5] 20-26</sup>。本研究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素质分为市民化的身体素质、文化技能素质、政治法律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五个要素。身体素质指新生代农民工由健康意识和健康行为共同反映出来的自身器官系统和机能的综合表现<sup>[6]</sup>；市民化的文化技能素质指新生代农民工通过日常工作生活中的学习、实践的积累而获得的科学文化知识容量和相应的专业技能知识体系和结构；政治法律素质指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法律意识、政治法律知识以及政治参与能力和依法办事能力；市民化的思想道德素质指新生代农民工在调整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品质<sup>[5] 28-29</sup>；心理素质指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能力、抗压能力和自我情绪调控能力等多方面的个性心理品质<sup>[7]</sup>，且采用和第一个变量相同的测量方法进行赋分。

###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湖北省新生代农民工分布集中的两家公司和一所高校进行实地调查，包括湖北省某汽车电子公司、湖北某食品企业、某高校社区及其在建工程的建筑施工队。两家公司的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制造业为主，某高校社区及其在建工程的建筑施工队新生代农民工从事服务业为主。2015年4-6月，调研组采用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收集一手资料。问卷调查方面，采取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发放调查问卷，由被调查者自己独立填写的方式进行。个案访谈方面，分别从两个公司选取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典型代表10人进行深度访谈，重点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素质的现状。本次调查总共发放问卷300份，问卷回收294份，有效问卷294份，回收率和有效率为98%，并对调查数据运用SPSS19.0进行统计分析。

## 二、数据统计分析

### （一）调查样本特征。

对比分析发现，调查样本数据与国家统计局《2013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特点总体一致，表明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被调查者在性别上男性占56. 5%，女性43. 5%，符合男性为主的性别总体特征；文化程度上，小学文化程度占4. 4%，初中文化程度51. 4%，高中文化程度29. 6%，大专及以上学历10. 5%，与初中文化程度为主的受教育水平相一致；务工所属行业上，从事制造业的占30. 1%，建筑业24. 5%，交通运输业7. 0%，批发和零售业6. 6%，住宿和餐饮业11. 9%，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11. 9%，其它行业8%，与以制造业、建筑业为主的就业行业特征一致。

## （二）调查数据信度。

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素质的调查数据进行信度分析，以检验问卷的可靠性。问卷总体信度为0. 893，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可信度。

## （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强烈。

1. 市民化的期望价值：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市民化收益大于损失。问卷调查显示，58. 5%的调查对象认为转变为城市户籍居民整体上是利大于弊，其中认为市民化后私人收益大于私人成本和非私人收益大于非私人成本的比重分别占调查总人数的61. 9%和63. 6%。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理性“经济人”，他们需要权衡获得城市户籍带来的收益与丧失农业户籍产生的损失，对思维活跃、敢拼敢闯和追求更好发展前景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市民化的期望价值在于满足其收益最大化。

2. 市民化的指令性规范：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自愿遵从国家市民化政策导向。55. 1%的被调者对国家市民化政策满意，并给予较高评价，58. 8%的被调查对象自愿遵从国家市民化政策导向。作为“农村精英”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文化程度较高，往往对国家涉农政策敏感，容易把握市民化政策中的发展机遇，契合国家政策导向，形成对国家政策的基本认同。

3. 市民化的示范性规范：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主动听取亲朋好友意见。62. 9%调查对象的家人支持其转变为城市居民，54. 1%的调查对象认为亲朋好友的意见对自己影响较大，52%的调查对象愿意听取亲朋好友的意见。向往城市生活、进城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一个相对陌生而又变化快速的城市社会，在缺少生活历练的情况下，对成为户籍城市居民的选择往往需要听取亲朋好友等重要他人的参考意见，以免选择失误。

4. 市民化的自我控制力：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认为个人可支配收入不足。仅28. 8%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收入高，18. 3%认为自己日常生活消费水平低、17. 4%认为交往费用支出少，20%认为交通通讯费用开销少。可见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自己收入与消费支出的比较，感知到市民化成本成为影响其市民化意愿的突出障碍，如何有效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可支配收入成为促进其市民化的重要路径。

5. 市民化的自我效能感：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身能力弱且自信心不足。认为自己就业、购买住房和转为城市户口能力强，融入城市能力强，对融入城市、实现身份转换有信心，以及融入城市、实现生活方式转换有信心的比重分别占被调查者的22. 4%、14. 3%、16. 4%和22. 1%。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自我效能感低，他们认为自己目前成为户籍城市居民的能力不够，信心不足。自我效能感决定人的行为目标选择以及完成行为目标的努力程度，较低自我效能感会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努力和效果，影响其市民化意愿。

## （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素质总体偏低。

1. 市民化的身体素质：健康意识较强而健康行为滞后。意识到良好饮食习惯有利于自己身体健康、感知到劳动强度大容易导致疾病的比重分别占被调查者的74. 5%和63. 6%，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充分认识到维护身体健康的重要性；饮食支出结构合理、注重饮食营养均衡，每天打工时间不超过8个小时和经常关注保健知识、定期去做体检的比重分别占被调查者的40. 8%、

41.9%和39.5%，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健康问题的关注与投入和他们的认知不符。在某汽车电子公司的访谈发现，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反映工作场所存在有害气体，长期吸进这种气体可能影响身体健康，但他们却没有采取行动和针对性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2. 市民化的文化技能素质：文化程度不高且专业技能缺乏。新生代农民工初中文化程度占51.4%，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29.6%；接受过非农技能培训的占24.8%，其中具有“初级技工”、“中级技工”、“高级技工”、“技师”等专业技能等级的占48%。表明文化程度不高，且专业技能欠缺。从文化技能素质的提升意愿来看，打算提高学历水平、接受指导和职业技能培训、支出更多时间参加培训和支出更多的费用参加培训的比重分别占被调查者的14.7%、27.6%、17%和20.4%，说明仅有少数新生代农民工有意愿提高自身文化程度和专业技能水平。

3. 市民化的政治法律素质：政治法律意识较强而政治法律能力不高。50.4%的调查对象了解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相关政治常识，53.1%的调查对象具有政治法律意识，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一定的政治法律知识，政治法律意识较强。他们在政治法律规范的指导下约束自身行为，积极参加工会选举、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和依法维权的比重分别占被调查者的31%、42.5%和62.3%，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民主参与能力和依法办事能力不高，政治法律意识与政治法律能力的不协调制约着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法律素质的提高。

4. 市民化的心理素质：心理调节能力和情绪控制力较弱。不会因为城市居民的歧视而自卑、主动与当地入交往、避免极端行为发生、通过自我激励的方式自觉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和通过转移注意力或与他人交流的方式来舒缓压力的比重分别占被调查者的39.1%、41.5%、44.6%、41.5%和44.6%。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心态、社会交往能力、情绪控制力、心理适应力和心理调节能力较弱，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5. 市民化的思想道德素质：总体水平较高但进步空间依然较大。58.8%的调查对象具有一定的平等、权利和责任意识以及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57.1%的调查对象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养成良好的个人品德，53.8%的调查对象勤恳敬业、诚实守信和脚踏实地，勇于担当社会责任。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道德素质主流是积极健康的，他们具有现代公民意识和相对良好的思想道德素养。但在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交流中发现，他们身上仍应秉持的勤俭节约、勤劳朴素、团结互助、助人为乐的优良作风已日渐消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以及“自私冷漠”、“性开放”、“缺乏社会责任感”等思想观念开始显现，这是新生代农民工思想道德素质在思想观念多元、多变时代受冲击的集中体现。

#### （五）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对市民化素质的影响效应。

1.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因子分析。分析表明，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五个构成要素调查数据进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的KMO 抽样适度测量值为0.768，近似卡方值为1491.162，自由度为136，显著性水平sig.=0.000<0.01，表明它们适合作因子分析。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最大旋转法从17个指标中抽取市民化意愿5个因子。这些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2.443%，且因子载荷较高，表明这些因子对新生代农民工意愿的解释效果较好。

2.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素质因子分析。分析显示，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素质的五个构成要素调查数据进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的KMO 的抽样适度测量值为0.837，近似卡方值为2629.980，自由度为231，显著性水平sig.=0.000<0.01，表明它们适合作因子分析。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最大旋转法从这22个项目中抽取市民化素质5个因子，这些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1.337%，且因子载荷较高，表明这些因子对新生代农民工素质具有一定的解释力。通过将每个因子值乘以其方差贡献率后相加，得出市民

化素质方程，其计算公式为：

$$\text{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素质} = (\text{心理素质因子} \times 0.13925) + (\text{文化技能素质因子} \times 0.13300) + (\text{政治法律素质因子} \times 0.12937) + (\text{身体素质因子} \times 0.11468) + (\text{思想道德素质因子} \times 0.09707)$$

### 3.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对市民化素质的影响。

(1)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素质的相关性。为把握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素质的关系，根据前面生成的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素质两个综合性变量，对二者进行积矩相关测量。结果显示，Pearson 系数为0.541，单侧检验显示，二者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素质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前者对后者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助于市民化素质的提升。

(2) 新生代农民工意愿各要素对市民化素质的作用。为把握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各要素对市民化素质的作用，以市民化意愿诸多因子为自变量，市民化素质为因变量，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进一步考察市民化意愿诸因子对市民化素质的作用。

分析结果显示，回归模型的确定系数为0.354，说明该模型可以解释市民化素质的35.4%，市民化意愿诸因子对市民化素质有较大影响，对应的t 值为0.000 < 0.01，表明该模型在0.01水平上统计显著。在0.01水平上市民化的自我控制力因子、自我效能感因子、期望价值因子和指令性规范因子进入模型，非标准化系数均为正数，说明这4个因子与市民化素质呈正相关且对市民化素质有重要作用。从标准化系数看，4个因子由高到低依次为市民化的自我控制力(0.398)、自我效能感(0.329)、价值期望(0.269)和指令性规范(0.162)，标准化系数越高，表明该因子对市民化素质的作用越大。因此市民化的自我控制力、自我效能感、价值期望和指令性规范与市民化素质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作用机理在于：市民化的自我控制力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新生代农民工首先考虑自己的经济条件能否承担市民化素质提升费用，工资收入水平决定其进行文化技能素质教育投资的力度以及市民化素质提升程度；自我效能感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知识技能和自身能力利于提升其成为户籍城市居民的自信心，进而影响其市民化素质提升的行为决策，对市民化素质有一定影响；期望价值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会考虑提高市民化素质能否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经济报酬和更高的社会地位<sup>[8]</sup>，对自身价值需要满足越多，越愿意提升市民化素质；指令性规范取决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素质提升需求与国家市民化政策供给的一致性，两者的协调程度决定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政策的认同及参与的积极性，对市民化素质产生一定影响。市民化的示范性规范没有进入该模型，可能因为新生代农民工身边的亲朋好友中已成功实现市民化的偏少，对其市民化素质的提升没有形成显著的示范效应。

##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实证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强烈，但市民化素质总体偏低；市民化意愿对市民化素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市民化意愿中的自我控制力、自我效能感、期望价值和指令性规范四大要素对市民化素质具有十分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其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序。提升新生代市民化素质，需要在准确把握市民化意愿对市民化素质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上述四大影响因素的积极正向作用。

第一，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市民化素质提升成本分摊机制。市民化的自我控制力是市民化素质提升的首要因素。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可支配收入是自我控制力的内在基础，提高个人可支配收入，降低市民化素质提升成本是提高其市民化素质的可行选择。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可支配收入只能满足其基本生活开销，没有相应的剩余进行个人素质提升投资，构建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新生代农民工等多元主体协同的市民化素质提升成本分摊机制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素质提升的制度保障。中央政府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资金的投入应处主导地位，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划拨中央专项资金、把农民工素质提升列入公共财政预算，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素质提升资金投入；地方政府应规范自身职能，加大市民化投入支持，使财政供给与市

---

民化素质提升支出需求保持均衡；充分发挥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力量，通过政策激励引导其对新生代农民工素质提升进行投入；切实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使其有能力支付必要的素质提升费用。最终形成政府、用工企业、非政府组织和新生代农民工协同参与市民化素质提升的制度化成本分摊机制。

第二，提高市民化能力和市民化信念。市民化的自我效能感是市民化素质提升的重要因素，市民化能力和市民化信念是自我效能感的核心内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居住、享有城市社会保障、获得城市户籍等方面的能力以及增强其定居城市的自信，对其市民化素质提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劳动力市场分割等体制性原因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社会发展需求，其市民化能力不强，市民化自信心不足。应通过外部环境支持和新生代农民工自我心态调整，促使市民化能力和自信心提升。外部环境方面，国家、企业和社会力量在政策制度保障、社会支持方面为新生代农民工营造有利于市民化能力和信心提高的良好环境。新生代农民工应进行自我心态调整，保持积极向上的市民化态度，以乐观上进的精神面貌努力提高自身文化技能，主动融入城市社会，全面提升身体素质、文化技能素质、政治法律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

第三，提高市民化目标需求的满意度。市民化的期望价值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素质提升的内在动力，市民化目标是否符合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利益最大化需求是其市民化期望价值关注的重点。新生代农民工提升市民化素质的根本目的在于成为户籍城市居民，得以在城市就业、居住和生活，与既有城市居民共享现代城市文明发展成果。应通过政策宣传、典型示范等方式，让新生代农民工充分预见到市民化素质提升的预期收益，降低提升市民化素质的后顾之忧。一方面，加强市民化政策宣讲力度，阐明市民化政策安排及预期目标；另一方面，大力宣传成功市民化的典型农民工，发挥示范引导效应，激励新生代农民工积极主动提升自身市民化素质。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在独立、自主评判中，作出理性的市民化素质提升选择。

第四，完善市民化政策体系。市民化的指令性规范是市民化素质提升的制度保障，市民化政策体系是指令性规范的核心组成部分，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劳动就业、技能培训、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城市住房等相关政策，将其纳入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总体发展格局中，对促使其提升市民化素质会产生积极影响。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强的市民化意识和市民化发展期望，如何把握一切可资利用资源提高自身素质，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目标需求。为此，应制定实施符合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素质提升需求为重点的培训规划，把技能培训和素质培训相结合，全面升级市民化素质；开展分层培训指导，针对不同文化水平和技能条件的新生代农民工开展分层次和针对性的指导，使不同素质结构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素质都能获得相应提升<sup>[9]</sup>。

#### 参考文献：

[1] Ajzen 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Organization [J]. Organization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1, 50(2) : 179 — 211.

[2] Cialdini RB, Kallgren CA, Reno R R. A Focus Theory of Normative Conduct: A Theoretical Refinement and Reevaluation of the Role of Norms in Human Behavior [J].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91, 24(1) : 201 — 234.

[3] Taylor S, Todd P A. Understand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sage: A Test of Competing Models [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1995, 6(2) : 144 — 176.

[4] 周文霞，郭桂萍. 自我效能感：概念、理论和应用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1) .

- 
- [5] 林世选. 国民素质论: 和谐社会构建与国民素质研究 [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 [6] 黄雪梅. 新农村建设农民素质教育 [M].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210 — 211.
- [7] 解思忠. 国民素质读本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 205 — 206.
- [8] 许东风, 睦鸿明. 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江苏省农民工的抽样调查 [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2( 24) .
- [9] 胡跃茜.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创新 [J]. 教育评论, 2012( 6) .